

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更為寬廣的視角，如同丁荷生在這本書所示範的，在不同的視域與研究方法下，從文化和經濟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羣如何理解、認識與選擇自身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歷史將會更能夠認識人類生活的軌跡。

上述所說的生活軌跡往往不會透過文獻本身透露出來，除了一般的傳統文獻、地方志和檔案外，地方史的研究者還必須透過田野調查和搜集材料的過程，進一步地理解實際的生活空間，透過當代的 GIS 科技，研究者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解人羣在地方當中如何活動，將生活的不同面向放進研究資料與方法當中，更加豐富地理解歷史。

胡川安

麥吉爾大學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338頁。

傳統中國社會的整合問題，歷來備受學術界關注。近年來華南地區的研究已經表明：在整合過程中，地區組織與國家制度、地方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是在不斷相互滲透的。華南的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宗族、廟宇系統方面。與之不同的西南地區，在中央王朝深入之前就已經建立並長期維持了類似於國家的政權組織。該地區在逐漸整合進王朝國家的過程中，必然呈現出與福建、廣東、臺灣等地區不同的景象。對這些地區如何把不同的國家傳統放進地方文化的研究，將有可能拓展我們對傳統中國社會整合問題的理解。溫春來的新著《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便是一個成功的嘗試。該書通過豐富翔實的漢、彝文獻材料，從「制度」、「開發」、「認同」三方面進行考察，論述了貴州西北部地區整合進傳統中國大一統結構，並形成對王朝結構較高認同的歷史過程，總結了在整合過程中，王朝與周邊族類的制度和傳統的互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本書作者溫春來從1993年起，求學於廣州中山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該書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但不拘於其中，稍有拓展。全書除導言、結語外，基本按時間序列展開，分為上、下兩編，第

一至四章為上編，第五至八章為下編。導言部份是全書的理論基礎，也是作者的思考所在。在對關於傳統中國社會整合問題的學術史的梳理，以及區域社會史與歷史人類學研究的理解和總結中，既闡明該書研究的意義，也表明了作者的方法論取向。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其研究的三個構想，即：第一，重構黔西北社會自身的制度與傳統，以及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個具有自己的政權、文字、禮儀，以及政治法律傳統的非漢族社會中推行與表達的過程，從而揭示王朝、周邊族類兩者的制度與傳統怎樣互動與交織，將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區域真正整合進中國大一統的秩序中；第二，通過豐富的漢、彝史籍比較，結合田野調查，提供一個可深入揭示中央王朝與周邊族類最初接觸情形的個案；第三，超越中國歷史研究中「一點四方」的思考模式，以所研究的區域為中心來進行探討，特別是盡量從原住民的角度去理解歷史的情景（頁9）。全書便是圍繞着這三個構想展開論述的。

上編〈從「異域」到「羈縻」：宋至清初改土歸流前的黔西北社會〉，論述了黔西北進入王朝版圖之前的歷史。作者在第一章利用現存的彝文獻，結合《宋史》、《桂海虞衡志》、《竹洲集》、《雲南志略》、《元史》、《貴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漢文獻，呈現中央王朝大規模進入黔西北之前當地多「國」林立的狀況，並考察了彝族君長國的「勾」政權和「則溪」制度，指出在宋元甚至更早的時期，黔西北本身已經形成自己的文字和制度，並且初具規模。

第二章着重討論元、明經營西南以及建立並逐步完善土司制度的過程。與以往的學者多從制度考辨入手不同，作者更加注重從地方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注重制度的具體實施過程中王朝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限於該時期地方文獻的匱乏，作者另闢路徑，通過明代土官職名的專門化和文職武職的考辨，並結合對土司地區賦役徵派的考察，認為中央王朝的種種政策，只是規定了朝廷與土司的關係，由於受到了彝制的制約，實際上難以對普通原住民形成直接的影響。作者從區域社會史的視角出發，把王朝制度的變化、國家禮儀等在區域社會表達的過程，與周邊族類自身固有的傳統結合起來考察的做法，始終貫穿全書。

第三、四章討論與土司制度有密切關聯的衛所制度、流官制度和科舉制度等，並指出隨着這些制度在黔西北的建立、發展，彝族制度和觀念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作者敏銳地抓住了驛道這個關鍵因素作為分析的突破口。入滇驛道是當時中央王朝經營西南的重要通道，明王朝政府為保障其暢通，沿

着驛道周邊設置衛所。衛所制度的建立並隨之而來的衛所移民潮流，「意味着一種新的文化和禮儀的傳播」，開始影響當地禮俗和文教。但這種影響還是極其有限的，主要還是停留在驛道、衛所、府州縣城周邊的居民與土司地區的上層統治分子。與驛道關係密切的彝族族類在制度和觀念上也有所鬆動。制度上，當地族類的承襲方式發生了從「更迭而為」到嫡長子繼承制的變化，以及開始對「此絕彼繼」傳統實行干預。與此同時，「勾」政權官員的身份也逐漸發生變化，漢人開始為官，尤其到了明後期，「勾政權中的漢把似乎越來越多，勢力也越來越大」（頁124）。觀念上，作者通過對水西安氏遠祖濟火的故事的討論，和黔西北發現的一些彝漢文合璧的碑刻的考察，指出：黔西北彝族在承認和利用「漢威」的同時，也在強調自己的彝威；「迨至土司制度建立及各項邊政制度的逐步確立與完善，勾政權的合法性在許多場合被極妙地歸因於對王朝的效忠而非本族之傳統，形成了彝威與漢威交織以及兩種價值觀並行不悖的情景」（頁137）。總體而言，中央王朝的影響範圍主要還是限於黔西北社會的上層。

下編〈從「新疆」到「舊疆」：改土歸流後黔西北地方社會的變化〉，描述了清王朝開闢「新疆」、改土歸流以後，黔西北社會的主要變化及其從「新疆」到「舊疆」的演變過程。第五章論述黔西北進入王朝版圖，成為王朝「新疆」的歷史過程。經過明末清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彝制崩潰，清王朝對水西、烏撒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一線之外，四面皆夷」的社會逐漸發生變化。原來的彝族的則溪制逐漸被改造成流官制和里甲制。原住民從原來只對土司、土目負責，變成了直接為清廷輸糧應役的編戶齊民。王朝制度和新的社會秩序的確立，表明黔西北已經演變成了「新疆」。

作者的考察表明，改土歸流並不能一下子根除舊制度，新秩序是在與舊制度的妥協和互動中建立起來的。第六、七、八這三章分別從制度變遷、經濟整合、身份認同三個方面論述黔西北如何成為「舊疆」的過程，勾勒了改土歸流之後該地區社會的深刻變遷。制度方面，改土歸流之後，雖然各級流官政權逐漸深入人心，但原來彝族政權的兩大統治階層土目和布摩並沒有在新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消亡。土目轉化成為官府默許的基層社會的控制力量。原來作為知識與文明象徵的布摩階層隨着文教的興起，則逐漸喪失其政治特權和正統性，轉化成為一種「單純從事祭祀、占卜、看風水的職業」。作者由此指出：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彝族制度遭受了重大的打擊，但它們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環境中變化、延續。經濟方面，黔西北銀、銅、鉛等礦

的大規模開採，適逢康乾盛世，對礦產有着強烈的需求，使得其在地理、經濟、軍事上都成為了國家的戰略要地，「同內地的聯繫與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而來的「王朝軍隊的屯種」、「直接統治機構的設置」和「移民的湧入」，又促使了黔西北「從農、牧並重發展到精耕細作農業」。制度、經濟上的活動，也影響了文化、習俗、認同方面的變化。彝人的族類界限觀念變得「動態而富於彈性」，族類認同變得靈活而且包容，流傳着許多「彝變漢」的傳說。另一方面，作者通過普底黃氏家族的個案也提醒讀者：這種文化認同的轉變並不一定意味着族羣認同的轉變，對王朝的認同不一定意味着對漢人身份的認同。（頁268）

綜觀全書，一如文學作品般，故事娓娓道來，而其中處處充滿哲學般敏銳的思辨。本書通過敘述黔西北地區逐漸整合進王朝國家的從「異域」到「舊疆」的歷史過程，實際上揭示了與華南地區不同的另一種中央王朝有效拓展統治範圍、建立統治秩序的模式。作者抓住了制度變遷、經濟開發和文化及身份認同三條主線，把黔西北的區域歷史進程放在中央王朝向西南邊遠地區不斷拓展的歷史中去考察，提出了理解周邊族類整合進大一統秩序中應注意的若干特點：第一，從「異域」到「舊疆」的演變過程；第二，內部競爭引導王朝擴張；第三，新秩序中的舊傳統；第四，族羣認同與統治認同的統一與分歧。這些特點不是結語部份孤立的總結，對每一點的提煉和分析，都蘊含在各章節的論述之中，是全書的重要關懷之一。這將大大啓發中國西南地區的進一步研究，同時也為了解中國社會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的特色體現在作者對文獻的運用上，尤其在各種文獻之間的比照分析中，頗見作者的文獻功力。作者將彝文獻、漢文獻與田野材料相結合，並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對這些文獻材料及田野材料進行「比勘、考辨和分析」，呈現地方歷史進程中的深層意義。從彝、漢文獻中提煉出來概括力極強的詞彙或短語，諸如「異域」、「舊疆」、「彝威」、「魯旺」、「啥」等，通過古人自己的表達，巧妙地抓住了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各種微妙關係。總之，這部著作通過黔西北的個案，憑借着作者對於區域社會史研究方法的透徹把握，以及他深厚的文獻解讀功力，提出了一個如何理解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以及大一統中國的形成過程與機制的研究方法，並將其付諸實踐，這無疑是該書最大的學術意義。

李曉龍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